

魏大海 李征 谭晶华

主编

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论文集



谭晶华：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日本文学翻译的四十年

李征：翻译词“文学”考——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与近代中国、日本

铃木贞美：“日本人热爱自然”说的诞生——藤冈作太郎《国文学史讲话》再考

李哲权：作用于《上海》的神话性表象——横光利一《上海》之解读

吴卫峰：俳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小诗·截句·汉俳、以及华文二行俳句的实验

刘小俊：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从“鹿鸣”谈起

李强：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为例

和田博文：中国文化的历史记忆——近景上海、远景苏杭

都市年轮 风物与情感

日本文学研究： 日本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论文集

魏大海 李 征 谭晶华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论文集/魏大海,李征,谭晶华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52-7325-7

I. ①日… II. ①魏… ②李… ③谭…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 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793号

书 名	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论文集
主 编	魏大海 李 征 谭晶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68068026
策 划	杨成舜
责任编辑	刘 迅
特约编辑	曹红星 王 伟
封面设计	祝玉华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10mm×100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38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325-7
定 价	5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编者前言

拉拉杂杂，我们仨，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精力，终于完成了我们第五部学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

诸位入选学者均提交了过硬的论文。如学会的老朋友、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贞美论及藤冈作太郎《国文学史讲话》“总论”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日本人是“热爱自然的民族”，以此为缘起，通过绵密的考证，旁征博引，解说了日本“自然观”形成、变迁与“传统的发明”之间的关联性，也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近代日本的文艺文化研究操之过急，急不可待地企图以欧美的概念和新理论解释究明日本文化的固有性，却忽略了乃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受容”。说实话，铃木贞美的文章难以一言以蔽之。李哲权关于横光利一《上海》的研究别具一格，水乳交融地以相关的身体主义理论解读了这部名作。有些年轻学者也在活用相关理论，但在解读作品时，总给人以两张皮的感觉。李哲权这篇论作堪谓经典。另一旅日学者吴卫峰的论作亦颇具新意，《俳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小诗·截句·汉俳以及华文二行俳句的实验》，相信会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三位留日博士、青年才俊的论文，也收入本期论文集中，即刘东波的“井上靖西域小说的源头《漆胡樽》”、周芷冰的“论芥川龙之介《湖南的扇子》——芥川的中国旅行与《湖南的扇子》”以及周倩的“芥川龙之介的‘魔都’表象——以童话《火神阿耆尼》为中心”。国际芥川学会副会长、关西学院大学细川正义教授的“论芥川龙之介《奉教人之死》——关注基督教之意义”和原武藏野大学教授原善的“融解虚实的‘作祟’——川端康成《处女作作祟》的恐怖与趣味”等皆为佳作。最叫好的是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征教授的论作《翻译词“文学”考——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与近代中国、日本》，学问、眼光，可谓登峰造极。其他佳作恕不一一列举。

大家知道，日本文学研究会将迎来4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恭请谭晶华会长、郑民钦副会长、刘春英副会长、吴念圣先生和其他几位学会的元老级会员拨冗操劳，写了异常珍贵的纪实性散文。温故知新。文章使我们这一代的老人感觉亲切，也会使年轻一代了解学会的历史、前辈学者的研究活动和音容笑貌。谁都不能慢待历史。作为编者之一，借此论集出版之际，尤其想向吴念圣等一批学会的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与感谢！伴随学会一路走来，辛苦了！我们可以愉快地说，某兄弟学会学者的评价令人欣慰，说道：“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是组织得最好的。”大家听到这样的评价，想必都会感觉愉快。愚在“蹉跎岁月、苗而不秀”的感触之外，亦体验了莫大的满足。我不后悔，珍惜近乎一生与学会相伴的缘分。我感谢恩师李芒先生、高慧勤老师，引我在这个疆域里摸爬滚打，与学会有了不解之缘。我也借此机会对现任会长谭晶华老师、常务副会长李征老师、诸位副会长、副秘书长和新老理事表示感谢，更感谢长期关注、支持学会成长、发展的新老会员。毫无疑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会有了今天收获的季节和繁荣景象。近年以来大家有目共睹、每届年会的参会者都有一百余人且近乎完成了新老交接。本届年会的回执，到现在为止已有180余份。

我于1985年洛阳外国语学院第三届年会时第一次参加年会，30余年来做过秘书、常务秘书、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自认不计得失为学会做了一些工作，耗时耗力却不曾抱怨。但此次内蒙古年会前有了烦躁的情绪和抱怨。或许到了年岁。当然跟历届年会比较，此次年会多出了许多自己不解其必要性的申报材料 and 手续等。作为学会秘书长，任何情况、任何年龄都应与时俱进、谦虚谨慎，而不能倚老卖老地轻易产生不良情绪。

本届年会理事会，愚将辞去秘书长一职，让贤于年轻有为的学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将继续为大家服务。最后，感谢青岛出版社杨成舜先生长期以来在出版学会论集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

祝愿我们的学会，有更加健康的良性发展。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秘书长：魏大海
2018年6月3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魏大海 [1]
------------	---------

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

——日本文学翻译的 40 年	谭晶华 [1]
----------------------	---------

翻译词“文学”考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与近代中国、日本	李 征 [10]
--------------------------------	----------

“日本人热爱自然”说的诞生

——藤冈作太郎《国文学史讲话》再考	铃木贞美 [21]
-------------------------	-----------

作用于《上海》的神话性表象

——横光利一《上海》之解读	李哲权 [41]
---------------------	----------

俳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小诗·截句·汉俳、以及华文二行俳句的实验	吴卫峰 [52]
------------------------------	----------

芥川龙之介文学空间研究 邱雅芬 [69] |

论芥川龙之介《奉教人之死》

——关注基督教之意义	细川正义 [78]
------------------	-----------

融解虚实的“作祟”

——川端康成《处女作作祟》的恐怖与趣味	原 善 [92]
---------------------------	----------

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为例	李 强 [106]
-----------------------	-----------

遗失的记忆·空间：安部公房的“满洲”体验 波濤刚 [116] |

“黄昏”的文学史 平冈敏夫 [126] |

伪满时期日籍文人的“国都”叙事 刘春英 [139] |

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从“鹿鸣”谈起	刘小俊 [155]
-----------------	-----------

井伏鱒二与新加坡	和田桂子 [167]
译介的时代镜像与文化政治	
——试论竹内好对茅盾评介的战后“转向”	裴 亮 [177]
中国文化的历史记忆	
——近景上海、远景苏杭	和田博文 [195]
日本文学经典《罗生门》的生成和传播	孙立春 [207]
伪满时期哈尔滨的都市表象	
——以竹内正一小说《吉尔曼公寓素描》和《马家沟》为中心	
.....	吴佩军 [218]
井上靖西域小说的源头《漆胡樽》	刘东波 [232]
论芥川龙之介《湖南的扇子》	
——芥川的中国旅行与《湖南的扇子》	周芷冰 [247]
芥川龙之介的“魔都”表象	
——以童话《火神阿耆尼》为中心	周 倩 [260]
缅怀李芒先生	文洁若 [271]
高慧勤先生的幸福	文洁若 [273]
三先辈、九大会和一些交流合作	
——兼述我和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缘分	吴念圣 [275]
怀念前辈大家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 40 年感言	谭晶华 [298]
忆林林先生	郑民钦 [301]
关于恩师黄瀛的回忆	杨 伟 [304]
清贫年代的革命激情	刘春英 [307]
怀念高慧勤老师	谢志宇 [310]
从吕老的专著到我的“社科项目”	于长敏 [312]
洛阳年会逸事	祝振媛 [315]
记我的日本文学启蒙老师刘振瀛先生	李 强 [318]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北京大学日语系潘金生教授访谈	翁家慧 [321]
刘德有先生	陈喜儒 [327]

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

——日本文学翻译的 40 年

谭晶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我国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为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而言，改革开放这 40 年来的意义尤其重大。1978 年以后，《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海》《日本文学》等文艺杂志纷纷创刊或复刊。“泉涓涓而始流，木欣欣以向荣”，《外国文艺》最早刊出韩侍桁和刘振瀛翻译的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和《水月》，给当时的读者送上一份惊喜，充分反映了经过“文革”锁国之后，我国读者对了解外国文化、希冀中国文艺繁荣的强烈渴望。

作为高校的一名日本文学教师和译者，我们正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合步同行，我们亲历改革，也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好时代。今年是实施改革开放国策 40 周年，也是我日本文学从译 40 年。“弹指一挥间”的 40 年，回想起来，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近在眼前。

—

1979 年下半年，《译林》首期创刊号发行，创刊号上刊登了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为当时的读者送上了一份大餐，据说发行 60 万册仍供不应求。《译林》的办刊宗旨是值得称道的。记得深受“文革”之害的老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都还心有余悸，不敢译介和研究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作品，生怕再犯什么政治错误。记得 1979 年我和莫邦富代表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日本文学研讨会时，与我同住一室的山东大

学金中老教授（新四军谭启龙的翻译，解放上海时的炮兵连长），因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特意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有关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一篇是他翻译了近30部的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的研究论文，最终他在会上宣读的还是那篇小林多喜二论。

回想当时可以理解的情况，为数不多的知名外国文学期刊都将古典或纯文学的译介研究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陶醉在“阳春白雪”的氛围中，而《译林》则以贴近大众的当代优秀通俗文学译介为办刊宗旨，优先选登能生动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优秀小说，在当时实属敢为人先的勇敢决策。后来得知《尼罗河上的惨案》刊出后竟引出一场大风波，有位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权威给中央领导写信，指责翻译、刊登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甚至惊动了中宣部和胡耀邦同志。但争论中《译林》的办刊宗旨还是得到了各方肯定，钱锺书、杨绛、萧乾、卞之琳、叶君健、冯亦代、王佐良、李芒等国内20多位学者成为《译林》的第一届编委。

在一些发达国家，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壁垒早已被打破，纯文学虽有一种被孤立的焦躁感，但还是占据着翻译文学的主流。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艺术表现上均显严整，具有十足的魅力。两种文学之间界线的消失，或许正是近代主义向未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转变在起作用，它意味着现今的读者识别装扮成作品的文学和文字装饰的作品的时代已经到来。总之，是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本身并不重要，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经典的文学才是重要的课题。

鼎盛时期的《译林》每期发行数十万册，即使在当今许多文学书籍为发行一万册而发愁、众多从事外国文学教育的老师感慨当今的青年学生“脱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之时，《译林》每期的发行量仍达近10万册。这使不少人反思，我们的文学作家、评论家、翻译工作者不能总是认为那些“阳春白雪、和者寡也”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我们关注文学，关注原创力也应该换一种眼光。如此看来，改革开放后一些从事文学翻译介绍的出版社及文艺杂志确立的办刊宗旨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也对我国文坛汲取外国文学精华、发展我国当代文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年二十六七岁的笔者，能够顺利发表译作并在译坛立足，全靠文艺出版社和杂志编辑的扶植，是他们使我们这些稚嫩的苗木长成了成荫的绿树。饮水思源，当年的出版人把办好刊物与培养翻译人才有机结合的做法令人永远难忘。

譬如《译林》的首任总编李景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很有眼光的文化人，他思维敏捷、不走老路、敢为人先。当年我们这些留校任教才两三年的小青年译者的

稿件很难被期刊和出版社采用，但《译林》的编辑们却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不讲论资排辈，唯才是举，大胆启用优秀年轻译者的稿件。笔者是在1979年9月的长春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结识李景端先生的，当时他谦称自己原本搞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外国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一再说明《译林》的办刊宗旨，希望所有老中青译者大力支持。我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感染，向他推荐了日本当代作家五木宽之的“直木奖”获奖作——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认为该作完全符合《译林》的宗旨和风格。李总编闻之大喜，很快拍板采用，并将该译作发表在1980年第1期的首篇。之后笔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在《译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日本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果没有《译林》这位“伯乐”的扶持和培养，我想当时的年轻一代译者或许无法成长得那么快。除了李先生之外，后任的总编竺祖慈、章祖德、叶宗敏、王理行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芒、高慧勤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洁若、叶渭渠、唐月梅先生，北京大学的刘振瀛、潘金生先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于雷先生，金中、吕元明、李德纯、林少华等都成了我在日本文学译界坦诚的导师和挚友。如今每当我们看到那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译者茁壮成长起来，看到日本文学翻译界变得如此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总会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具有强烈责任感、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学者和出版家们，是他们以“翻译、传承、超越”的精神，精心浇灌、栽培并悉心呵护、守卫着文学翻译这片美好的园地。

40年来，外国文学领域中的日本文学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发表出版的日本文学译作已达千余种。我国日本文学的研究在译介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光是古今作品的研究，还有文学史、文艺思潮史、俳句和歌史、作家评传、中日比较文学、散文诗歌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开展，积累了不少优秀的成果。1984年5月杭州的中青年译者座谈会、南京日本岛崎藤村文学研讨会、俳句和歌的专题研讨会、十多年来日本文学作品的有奖翻译比赛的盛况，至今留在许多日本文学翻译家的美好记忆中。日本文学史、文艺思潮史的专著和译著，日本文学词典的出版，对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也起到了可贵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各出版社及外国文学杂志与我同行的这40年，虽然有过困惑，遇到过艰难，几十年不变的稿费税率（1980年每千字稿费6元时的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至今40年未变），不及钟点工的稿费收入（若一天从早到晚翻15首五七五七七31音的日本和歌，译者至少要译出作者的心情和

意境，可是按出版社现行的除去空格的电脑实际字数计算，却不满300字，稿费约为25元），如同无偿奉献，但也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精神世界饱满充实，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深感许多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及支持的重要。

二

我17岁从上海华东师大第一附中毕业后，去江西井冈山地区峡江县一个四县交界、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修理了六年地球后，于1974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大三那年，翻译课老师老华侨张诚找来五木宽之的小说《黄金时代》让我们分组练习，最后又令我统稿，试图给译文出版社的《摘译》（《外国文艺》前身）投稿。我在老师指导下忠实地理解原文，兢兢业业翻译、校改、润色，虽然最终未能发表，但那是我第一篇文学翻译的习作。

1977年留校工作后，便一边教学一边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80年1月首篇中篇小说在《译林》成功刊出后，得到稿费200余元。当时大学生“赤膊”月薪是45元，译稿费每千字6元，这笔大约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稿费，居然成了我1982年新婚旅行福州、泉州、厦门、杭州的资金，相当难忘。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新中国前30年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佳作，故这两家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在我们这些年轻译者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很具吸引力，尽管要闯进去并不容易。1984年我读了野坂昭如的“直木奖”获奖作《萤火虫之墓》，十分感动，很快将它译成中文，还试探着询问译文社的资深编辑能否刊登，他回答说该作家的作品大都较“黄”，恐怕不行。我又请教刊出的原则究竟是看作家还是看作品，回答说是作品。我立刻将译作投给《外国文艺》，结果这篇描写日本战后流浪儿悲惨命运、感人至深的作品发表在该刊1985年的第四期上，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外国文艺》。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日本文学》是日本文学界钟爱的一块领地，我在上海图书馆分多次借阅许多日本杂志译成的第一篇万字评论文《日本各家论川端康成》就刊发在该杂志1983年第三期上。那时候，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本双月刊《外国文学报道》（后改名《环球文学》）除了刊登译文外，还发表文学评论译作。我在那本杂志上不仅经常发表一些日本文学的综述，还在1986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尾崎秀树的评论《我之大众文学观》，在次年的第五期上发表了《日本新进作家论六篇》（岛田雅彦论、增田子论、桐山袭论、川西兰论、泽桂论、桐山袭论）。

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译作是由四部组成的菊田一夫的畅销书《请问芳名》，

由上外四位文学教师各译一部，全书 65 万字，我承担了第三部的翻译，1988 年 3 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在 1996 年被中国台湾远景出版社购去版权，同年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发行。

笔者第一部主编出版的中短篇小说译作是 1989 年出版的《日本战后小说选》，那是“文革”后国内出版的第三本中短篇小说集。当时出版社规定，已经译过的作品不能重译，所以 1980 年至 1982 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战后小说选》（1、2 辑）最早，1983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高慧勤主编的《日本短篇小说选》质量最好。我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的小说集中译了大田洋子的中篇《半死的人》及五个短篇，还为该书做了序言。

1987 年，笔者翻译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影片《苏绣》，那是本人尝试的第一个中译日的译作。之后，在 2008 年又翻译世博会的宣传片《魅力上海》等中译外的作品。

20 世纪 80 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在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不时会遇到各种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我亲身经历了不少有趣体验。1983 年读到日本集英社 1979 年出版的《纯爱小说名作选》中三浦哲郎的爱情小说《初夜》，我深受感动，将它译成了中文。交到译文出版社后，编辑评价“很动人，译得很有日本味”，却并未采用。适逢吉林人民出版社要出一本《外国爱情小说名作选》，于是赶紧寄去。责编的评价也很好，很快出了清样。可三个月后，该译稿又被退了回来，说是总编在最后审阅中，独独排斥了这一篇，没有任何理由。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难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结婚后就没有初夜吗？甚至还想到，是否主人公家子女太多且大都不健康，有违背计划生育国策之嫌？译稿在我的抽屉里一睡几年后，上外外文所所长廖鸿钧教授受上海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一本《当代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向我要日本文学的译作。鉴于前几年的教训，我将《初夜》的题名改成《纯真的爱》，结果很快在 1989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顺利地出版。直到 2015 年 1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浦哲郎小说集《忍川》时，《初夜》才被正名后收入。

1985 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名作系列作品，当时的资深编辑要我提供日本唯美派大家永井荷风的代表作。我立刻求教日本大学的荷风研究家平岩昭三教授，他热情地寄来了该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其中的《比手腕》（《腕比べ》），佐藤春夫认为是日本描写艺伎生活最好的长篇小说。艺伎们钩心斗角，有的靠大款，有的傍权贵，善良老实者处于劣势，但结局却受到老天的眷顾，一点不吃亏。但是，该作品在 80 年代中期因描写艺伎生活，被编辑毫不犹豫地否决，

不能入选翻译。直到1999年，作家出版社才出版了它，取名为《较量》。笔者所译的这部作品取名为《各显神通》，于2012年出版。在五年合同期满再版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责编要我把标题改得“更香艳些”，意即把书名改得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后改成《争芳斗艳》，最终主编拍板定为《竞艳》。据说“较量”像是谍战内容，“各显神通”有武打小说之嫌，“争芳斗艳”又未免有点俗气，“竞艳”则与作品主题不尽相符。姑且不说哪个译名最好最合适，从不能翻译到要香艳吸引眼球，这个过程本身不是很好地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所带来的观念及各方面的变化吗？

就这样，在我40岁之前，我在上述各出版社及外国文学期刊还发表出版了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海与毒药》，中短篇译作有佐藤春夫的《女人自焚》、石川达三的《一个堕落女人的诗集》、黑岛传治的《崖下的人家》、石坂洋次郎的《雾中少女》、城山三郎的《事故董事》、山崎丰子的《陪嫁钱》《遗物》、源氏鸡太的《随员》《流冰》、川端康成的《精通葬礼的名人》、永井龙男的《青梅雨》、山田智彦的《特殊休假》、八木义德的《风祭》、中上健次的《隆男与美津子》、田久保英夫的“芥川奖”获奖作《深深的河》等40种。不论是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的作品，都是精心挑选的优秀之作。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我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和提高。

40岁后，我从日语系主任岗位调到校部担任科研研究生部主任、校长助理，1994年起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1990年起开始指导硕士生。教学和行政管理占据了不少时间，但在50岁之前，只要一有机会，我仍然没有放弃日本文学的翻译。记得1993至1994年间，任溶溶老师临时担任《外国文艺》的责编，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不耻下问的谦逊态度令我这个后辈深受激励和鼓舞。我在此期间，连续在该刊发表了边见庸的“芥川奖”获奖中篇《自动起床装置》、日野启三的《海峡这边的家》、黑井千次的《圣产业周》和《夜友》、上林晓的《四万十川河的幻想》及三岛由纪夫的《我的阅历时代》等译作。1996年至1998年间，沈维藩调入《外国文艺》当执行主编，他又约我翻译了室井光广的“芥川奖”获奖中篇《奥德鲁迪克》、奥泉光的“芥川奖”获奖中篇《石头的来历》、辻原登的中篇《曼依的肉体》等作品，这些具有开拓性技巧的作品在中国作家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据说上海作家蒋丽萍生前曾致信责编，谈到《曼依的肉体》的创作时说，“真没想到当代的小说还能这样写”。这十年间翻译的各类小说有15种。

20世纪90年代，我翻译出版的长篇译作有五木宽之的《冻河》（译林社）、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重庆社）、川端康成的《山之声》（河北教育社）和

永井荷风的中短篇小说集《地狱之花》及谷崎润一郎的中篇《盲瞽者谭》(均由上海译文社出版)。此外,这一时期还先后参加了陈德文、李芒、高慧勤、周平主编的《日本散文选》《世界散文经典》《日本散文经典》《风流樱花雨》等的散文集翻译,共发表了17篇随笔名作的翻译。

2001年至2011年间,由于担任博导,又承担了“十五”“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外文出版社的初中级翻译教程的总主编任务,另有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及上外教社的“走进经典”阅读系列的主编及多本词典的主编、编写工作,日本文学的翻译处于停滞状态,这十年间只有少量的随笔和中译日的译作发表。

2011年6月,在我年满60岁时,不再担任上外常务副校长职务,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兼职工作之外,我又获得了自己钟爱的文学翻译的时间。2011年至今,我已经完成出版了长篇小说的翻译6部,它们是夏目漱石的《心》、永井荷风的《各显神通》、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安部公房的《密会》、小池真理子的《无花果森林》、樱木紫乃的《大爱无语》;另有中短篇小说集有岛武郎的《诞生的苦恼》(6篇)、三浦哲郎的《忍川》(7篇)、川端康成的《爱的人们》(9篇)。已经签约的日本文学名著的翻译合同另有10本。已经交稿的《永井荷风文集》(明治、大正、昭和叁卷本)每卷30余万字,共95万字。除已出版的旧译,该作家其他名作翻译《美国故事》《法国故事》《隅田川》《欢乐》《散柳窗的晚霞》《晴天木屐》《雨潇潇》《焰火》《五月细竹》《出租屋的女人》《紫阳花》《避世隐忍的妾》《舞女》《有夫之妇》《断肠亭日记》《勋章》等作品悉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购得版权的五木宽之的中短篇小说集《看那灰色的马》(5篇)也即将出版。现在手上翻译的还有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明暗》和谷崎润一郎的《各有所好》等等。

三

以往的日本文学翻译实践,使我对文学翻译积累了一些心得,颇有感慨。

时光荏苒。40年来,我见证了许多老一辈日本文学的学者、翻译家的辛勤耕耘、言传身教,他们求实、严谨、谦和的作风,感染影响着我们及下一代年轻的译者。他们都是如雷贯耳、学识渊博、译著等身、名播四方的大家,是我们崇敬、心仪的楷模,是他们让我们从稚嫩的苗木渐渐长成成荫的绿树。譬如萧乾、文洁若翻译的名作《尤利西斯》经历数载艰苦的翻译打磨,其精神对我们这些后辈有很大的感染和激励。2007年仙逝的高慧勤研究员曾主持600万字的《川端康成十

卷集》《芥川龙之介全集》作品的翻译,其译著风格贴近原作,选词炼句精益求精,语言典雅优美,堪称逸品。记得1982年我译司马辽太郎的《二军师》,其武士对话均为古文,高老师认真地将我自以为得意的近2万字译稿改得满篇通红,从而使我懂得了文学翻译绝不仅仅是理解外语,对于古文与现代语、文章语与口语的区别和把握,对于文学意境的传达有了深刻的理解。译者要甘于清贫,坐得住板凳,恰似长距离的慢跑,在翻译实践中,语言和文学性的凸显是文学翻译必须关注的侧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使自己的才、学、识变得更加厚实、丰富。

近些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对于翻译的讨论十分广泛和深入。从大学学习时代的“直译”和“意译”,严复的“信达雅”的主张到林少华的“才子、学者、工匠”型译法;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到传统译论核心的“诚于译事、修辞立成、案本求信、以象达意、译以致用、文章正轨、以文行远”,同时有更多译者已注意到翻译与创作、翻译观与文学观的关系。我意识到作为一名译者,无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维护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方面,翻译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高慧勤所说:“翻译理应忠实原作,但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字语义上的翻译,还包括原作的风格、原文的美感和诗意的转达,翻译中失去了这些就谈不上忠实。”作为译者,应时时站在作者和人物的立场上,以理解的态度去阅读作品。“翻译要离形得似”,“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罗新璋语),在整体上把原作的风格贴切、到位、传神地表达出来的,就是好的译本。这是需要译者付出终生努力,不易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我现在还正朝这个目标在迈进。

文学翻译的成果还能很好地促进研究。我始终认为,日本文学翻译不做到一定的程度,评论和研究就会缺少相应的氛围和基础,高水准的活跃的研究活动也难以继。这是因为现在的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中,毕竟还有不少日语专业以外的学者。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两国间告别的20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两国关系磕磕绊绊,不很正常。但是我国开设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已达500多所,招收的硕博士研究生也越来越多。经典的日本文学译作对于今后莘莘学子的学习和研究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此外,比起生搬硬套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来做研究的流行做法而言,我更欣赏那些细读、精读文本,依据文本内涵来解读、研究作品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细读文本乃最佳的研究方法之一”的想法也并不为过。这也是我文学翻译做到今天的心得之一。

如今,在与那些和我一样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的同行、老友의言谈之中,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在“花甲”至“古来稀”之时,虽无伏枥之志,倒也不想抱残守缺,

聊以自喜，只要可能，总还希冀为推进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身体力行，摇旗呐喊，再尽绵薄。

让我们以陈毅元帅“花甲花朝仍少年”的诗句来共勉吧。

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科研研究生部主任、校长助理、常务副校长；1997年至2013年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日语分委员会主任、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曾于1988年至1989年在东京樱美林大学、1996年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和研究。

长期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及日语专业高年级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主持承担了许多科研课题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著有小说《美人蕉》（获日本《朝日新闻》社和送书会举办的征文比赛教师组“最优秀作品奖”）、《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川端康成传》；编有《日本近代文学史》（获2011年国家级精品教材）、《世界文学大辞典》、《现代派文学辞典》、《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主编）、第六、七版《辞海》（2009年、2019年外国文学分科主编）、《简明日汉·汉日辞典》（主编）、《新编日汉微型词典》（主编、词典均合著）、《日语新辞典》（主审）、《日本文学词典——作家与作品》（主编）；出版有“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日语综合教程》（5-8，总主编）、《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指定教材》系列（8册，总主编）、“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三十五种（总主编）。在日本《早稻田文学》《艺术至上主义文艺》《国文学与鉴赏》《日本研究》及国内的《外国语》《日本学刊》等杂志上发表《远藤周作的文学与宗教》《溷东趣谈论》等论文75篇；并有日本文学名作的译著计120余种、350余万字。1992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获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翻译成就奖”，2007年被评为二级教授，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2015年被评为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谭晶华教授同时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学术基金会评审专家；担任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项目负责人。

翻译词“文学”考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与近代中国、日本

李 征

一、《六合丛谈》与伟烈亚力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终于被西欧列强的军事力量打破。随着大陆沿海五个城市（上海、厦门、宁波、广州和福州）对外开放，原被严加禁止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进入新阶段。有关基督教的著作、报刊等相继出版。1857年，创办于上海的中文月刊杂志《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就是其一。此前，传教士刊行的中文杂志仅有在马六甲及香港等地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数种。虽然同是外国传教士的出版物，但因《六合丛谈》是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月刊，拥有众多大陆读者，其影响力自非锁国时代可比。并且，《六合丛谈》不仅受中国读者关注，还曾传播到幕末时期的日本，成为日人摄取近代西方学术的必读书目。^[1]

据卓南生《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 1815-1874》介绍，《六合丛谈》总编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为英国传教士，1847年受伦敦传道协会派遣来上海，最初在墨海书馆（伦敦传教协会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所）开展活动，其活动内容不限于传道，也包括给英文及中文报刊撰稿，还翻译了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六合丛谈》就是他立志以文书传道的计划项目之一。^[2]

由伟烈亚力撰写的《六合丛谈》“小引”（发刊辞）说：“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于兹矣。”^[3] 据此可知，外国传教士来中国布教已十余年。像伟烈亚力这种清末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在与中国民众的交流中，难免因语言隔阂、风俗差异而导致沟通困难。因此，包括伟烈亚力